

# 面对“舆情焦虑”，做好“三个判断”

张浩

以事实判断为基础,以价值判断为导向,以技术判断为桥梁,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,并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,才能有效减少舆情、应对舆情。

## 海音公语

当前,“舆情焦虑”在有些党员干部中较为突出。

不可否认,在社交媒体时代,舆情应对是各级党员干部的必修课。舆情万变,课程难修。压力之下,有的以“灭火”思维处理当事干部来“摆平”舆情;有的“等上级通知”“听领导安排”,把球踢给上级。这些,都不是舆情应对的正确姿势。

“万变”不离其宗。要做好舆情应对,仍然要从认知和实践的底层逻辑中寻找答案。舆情应对的方法论,归根结底,就蕴含在以下这三个判断里。

事实判断是基础,主要回答“是不是”的问题。

事实判断核心是调查研究,主要考察对事物或现象的观察分析能力。面对舆情,调查研究要围绕核心关切,坚持实事求是,努力倾听各方意见,弄清事情真相。

比方说,北方高校学生宿舍要不要装空调,就得调查所在城市气候、学生诉求、学校财力、同城同域高校有无相关案例参考等

等,尤其要弄清近些年气候有哪些新变化,极端性气候是不是越来越多。可以说,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“最先一公里”,只有全面客观地弄清事实,才会拥有做好决策、应对舆情的底气。

比如武大图书馆事件,搞清楚有没有“性骚扰”的客观事实,是学校作出处理和应对舆情的首要前提。

以事实判断为前提,弄清楚“是什么不是什么”,领导干部才不会犯主观主义、经验主义错误,不会在舆情压力下无所适从,随舆论风向而左右摇摆。同样,包括媒体在内的舆论引导也应时时谨记以事实判断为前提,谨防在事实不清的情况下带偏风向。

价值判断是灵魂,主要回答“应不应该”的问题。

价值判断是行动的底层驱动力。应对舆情的抉择决策,依托和体现的就是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。

比如,近年来一个个具体案例,“唤醒”了刑法第20条,推动治安管理处刑法

对“互殴”的重新修订等。正是民众心中“法不能向不法让步”的朴素观念,推动了司法系统价值判断的改变,进而推动了法治进步。

再比如,10月龄婴儿在动物园一展馆内用奶瓶喂奶,遭工作人员以“禁止饮食”为由制止,并拒绝道歉引发舆情。舆论的批评,正是缘于这种管理苛刻与公共服务善意相悖,与天理人情不符。

面对舆情,多与群众共情、换位思考,才能做出更合常识常理常情的价值判断,才能在应对中求得最优解——学校与学生共情,就会想办法解决学生宿舍空调的问题;列车员与乘客换位思考,就会想办法解决通风问题而不是拖至乘客砸窗。

需要提醒的是,与群众多共情,并不意味着泛化问责、过度问责。以事实为准绳始终是舆情应对的准则,否则同样会引发舆情反噬。

技术判断是手段,主要回答“可不可以”的问题。

技术判断和价值判断不可分割,回答好了“应不应该”,才能更好地回答“可不可以”。

“可不可以”往往指向的是规章制度,聚焦的是合规性问题。建章立制、遵章办事是形成良好秩序的前提。但是,面对新情况新问题,如果机械地拿规定说事,就有可能掉进教条主义的陷阱,把一句“按规定办”当成万能的挡箭牌。而与群众多共情,就会在遵守规定的前提下,积极地解决问题,而不是踢皮球,导致舆情拖沓越大。曾几何时,开具奇葩证明就是所谓“按规定办”,只作技术判断、不作价值判断的反面典型。很多“按规定办”引发的舆情背后,需要反思的恰恰正是“规定”本身。

总之,面对“舆情焦虑”,三种判断缺一不可。以事实判断为基础,以价值判断为导向,以技术判断为桥梁,始终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,并真心实意地解决问题,才能有效减少舆情、应对舆情。

而能否综合把握这三种判断,根本是政治判断力的体现。只有提高政治判断力,树立正确政绩观,才能在舆情面前稳住神、沉住气,做到既守规矩又有情怀,既有勇气“敢为”又有办法“善为”,进而在全社会引领形成一股改革创新、干事创业的新风气。

## 大众时评

这个暑假,一群刚刚卸下高考压力的学子,再次走入辅导班的教室。继“幼小衔接”“小初衔接”等各类衔接班后,面向大学准新生的“高(中)大(学)衔接班”在多地悄然兴起,成了教培市场新赛道。据报道,“高大衔接班”学的主要是大学英语、高等数学等课程,部分衔接班还面向准大学生提供针对“保研”的辅导课程。高考终场铃,俨然成了新一轮竞赛的发令枪。

从课程设置看,所谓“高大衔接班”,无非是教育焦虑向高等教育阶段弥漫背景下,教培机构嗅探商机包装出的一门新生意。然而,究其成因,它与近年来考研“高考化”、课堂手机集中管理、组家长群寄成绩单等现象一脉相承,共同指向一个趋势,即“大学高中化”。

大学是青年迈向真正成年的关键过渡,理应是一段充满试错空间、鼓励多元探索、孕育无限可能的时光。然而近年来,越来越多人发出“大学越来越像高中”的感叹。透过现象,所谓“大学高中化”的症结,还在于“他律”的持续依赖和目标路径的单一导向。

这一现象背后有其形成的心理机制。经历了一段时间目标明确的高考备战,青年学子在踏入大学校门、迎来法律意义上的成年时,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选择。课程、社团、就业方向……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向新生敞开怀抱。但若未能形成独立决策、驾驭自由的能力,这些自由反而会让他们脱离应试路径的学子陷入迷茫与焦虑,驱使部分人本能地寻求熟悉的路径和确定的目标。

做题、考试、卷排名,就成了一条安全的老路,以暂缓对未知的恐惧。以知识为内容、以升学备考为目标,“高大衔接班”,也就成了从高中向大学过渡的精神“代步车”。然而,依赖这辆“代步车”,一时或许走得稳、走得快,却也将真正意义上的“独立行走”不断后延,表面的领先,可能意味着深层次成长的停滞。

与此同时,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,也在强化着对保研、考公等选拔路径的依赖,将学生推向卷绩点、刷题题的路径。“大学高中化”的趋势,无论是高校外在的过度管理,还是学子内在的路径依赖,抑或家长延续的教育模式,都反映了个体的共同焦虑。

这个夏天,在“高大衔接班”涌现的同时,北京大学也进行着取消绩点的尝试。这是顺应教育改革潮流的积极举措,在绩点内卷的当下,具有破冰意义。期待越来越多的改革尝试,能为青年撑起更多元的探索空间,而非永远想着“抢跑”,在一条道上卷到底。

弥合“高大衔接”的断层,需要多方的努力。高校要承担起责任,关注学生需求,改革评价体系,优化课程设计,强化能力培养与生涯指导,真正为学生拓展可能性提供支持;作为成长主体的青年学子,也要在可能的范围内锤炼独立思考 and 自主决策的能力。毕竟,人生没有上不完的“衔接班”,能支撑人穿越未知旷野的,只有自己的筋骨。

# 莫让「高大衔接班」延滞自立脚步

凯铭

## “假院士”风波里的“真教训”

赵晓昕

近日,围绕“俄罗斯外籍院士”“苏辙后人”苏文的身份打假风波持续发酵。据报道,其与河南郟县签订的33亿元投资项目早已在去年作废,目前该县正在走程序注销该项目。至此,随着“假院士”现形记的落幕,背后隐藏的地方招商引资焦虑、监管失察等“真问题”逐渐在台前显露。

苏文打着东坡先生教育培训中心主任、海南东坡书院院长、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的名号,2022年与郟县签订了计划投资额高达33亿元的东坡书院综合体建设协议。如今项目因欠久没有资金到位而“流产”,其本人“俄罗斯外籍院士”的核心头衔也在求证下被发现“查无此人”。

钱钟书在《围城》中虚构了一所“克莱登大学”,主人公方鸿渐买下该学校的假文凭,试图粉饰门面、糊弄家人,闹出一串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。时至今日,人们对虚假头衔的迷信和利用依然存在,导致借“洋院士”名号来唬人,靠伪造身份招摇撞骗的奇观反复上演。

一方面,是不少人仍然迷信权威、专家等标签,给了骗子生存空间。另一方面,部分机构和单位为了摆排场、撑门面,乐于邀请所谓院士、专家等为自己站台,却疏于对他们的身份核查与把关,以至于反过来被骗子利用,客观上为他们提供了平台和背书。

据悉,“俄罗斯自然科学院”本身就并非正统或被广泛认可的学术机构,曾陷入高价售卖院士头衔的质疑。这样含金量真实性都存疑的院士身份,何以一路敲开地方政府大门?

对此,曾主持合作协议签约仪式的相关负责人解释,起初苏文是“省里某单位的一位干部介绍来的”,加上这并非一份正式协议,因此没有

“再往下深查”;还有相关人员表示,“咱不是法官或者记者,对他的背调比较有局限性”。招商引资涉及重大公共利益,地方政府岂能以围观心态置身事外,完全推卸把关责任?没有能力或渠道核实“院士”身份只是失职的托词,既折射了风险防控意识的缺失,也暴露了招商引资过程中的制度性漏洞。

颇有讽刺意味的是,项目虽无实质进展,苏文却实实在在地拿到了个“郟县东坡书院院长”的头衔,如此真假假,反而成了他招摇过市、攫取更多名利资源的“护身符”。若事件背后还隐藏着利益输送或“假戏真做”的猫腻,则更需深挖严查,给公众一个交代。

面对一地鸡毛,相关负责人称,“他(苏文)也没有拿走县里一分钱的東西,(县里)没有受到任何损失”。真的没有损失吗?事件成为负面典型,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在舆论漩涡中严重受损,还有错失的时间、机遇等机会成本,如果说没有损失,属实是有点自欺欺人。如果不能痛定思痛,深挖监管失察与制度漏洞的根源,仅以“假院士”风波受害者自居,在反思时避重就轻,所谓的修复营商环境、重塑政府公信力,不过是空中楼阁。

一个“苏文”的倒掉,带出了地方发展急于求成、招商流程虚设等深层病灶。避免“苏文”们找到下一个“舞台”,各地亟须摒弃唯规模、唯数字的畸形政绩观,警惕“头衔”崇拜、“帽子”崇拜,将科学论证、风险评估与严格监督嵌入招商引资资金链条。唯有铲除骗子滋生的土壤,才能少些“没有造成经济损失就不算损失”的掩耳盗铃式闹剧。



## 漫评

### “内增高”不是真的高!

【事件】
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近日调查发现,为餐具或包装加装“内增高”做法并非个例,一些餐厅通过使用加厚、垫高的餐具,让餐品看起来分量更足;部分商家通过在商品包装盒内加垫硬纸壳,增加商品内层包装面积等方式,让商品看起来更“高大上”。

【点评】

尽管部分商家辩称“标注了净含量”,但这些做法均利用了消费者的视觉习惯,制造“物超所值”的错觉,属于典型的商业误导行为。从法律角度来看,此类行为涉嫌违反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,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。

目前,对“内增高”包装的监管存在两大难点:一是国家标准对“功能性”与“欺

骗性”包装的界定模糊,执法尺度不一;二是商家常以“工艺需求”“美观设计”为由搪塞,而消费者因维权成本高、举证难,往往选择沉默。但放任此类行为,将助长市场恶性竞争。

要根治“内增高”乱象,从法律层面,需要修订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及配套法规,明确禁止误导性包装,细化欺诈认定标准,如规定包装空隙率上限,并要求净含量标注必须醒目、易读。从监管层面来看,则需要加大抽检力度,建立“包装合规负面清单”,对屡犯商家实施信用惩戒;同时推动12315平台与电商数据互通,简化维权流程。此外,还要引导行业自律,鼓励行业协会制定包装设计规范,引导企业摒弃华而不实的营销手段。(文/苑广阔 图/黎青)

## “沉睡”的民生工程该醒醒了

孔德洪

据《人民日报》近日报道,黑龙江绥化市王先生反映,当地东城客运站作为绥化市向社会公布的惠民工程之一,总投资3600余万元。然而,该工程2015年建成后一直未启用。市搭客乘坐出租车仍在破旧的老客客运站,十分不便。记者调查发现,除了东城站,另一座耗资5000余万元建成的六合站,也在2015年年底建成后,仅运营了一年多就因亏损关闭。

当地交通运输局将原因归结于拆迁滞后、施工单位材料报送不及时、未做最后结算,施工单位则反驳称拆迁户不影响车站运营,验收材料早已补齐,并直指“干部不作为”。据报道,十年间交通运输局数度换帅,施工单位多次请求推动却屡屡碰壁。这其中,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沉疴若隐若现。这背后,是责任链条的断裂,更是对民生福祉的轻慢。

另一座耗资5000余万元建成的六合站,则与决策失当有关。当地表示,六合站的建设寄托于新区规划,但后来新区建设未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,六合站却在此前已仓促上马,导致投运后因客源不足被关闭。

此类现象并非孤例。在不同地方,也存在一些惠民工程或规划拍脑袋、执行打折扣、监管瞎只眼开,最终落得烂尾、闲置的结局。这不仅是真金白银的流失,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侵蚀。要知道,百姓对每一项民生工程都满怀期待,若“好事办砸”,概率不止,怎能不损信任堤坝?

破解这一困局,亟待拿出刮骨疗毒的决心。相关部门当深刻根源,扛起责任,一方面打破“历史遗留问题”的僵局,明确结算责任主体与时限,让资金梗阻不再成为借口;另一方面,倒排验收流程,强化部门协同,倒逼闲置项目尽快从“沉睡”到“苏醒”。

更关键的是,要构建全周期监管链条,从规划立项时的可行性论证,到建设中的进度跟踪,再到验收运营后的效能评估,全程扎紧制度笼子,让民生工程不再“跑偏”。

民生无小事,枝叶总关情。一座客运站的启用,看似是城市运转的细枝末节,实则是检验执政初心的试金石。期待其他存在同样问题的地方以此为警醒,用实实在在的实际行动唤醒“沉睡”的民生工程,让惠民工程真正惠及于民,也让群众看到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与诚意。唯有如此,才能夯实信任堤坝,让城市发展更有温度,让民生福祉更有质感。



沉下去观察,立起来评说

官方微信: 捞舆工作室

投稿邮箱: dzrbplb2016@163.com

# 发展校园足球,山东踢法重在“突破”

原森

众所周知,山东是足球大省,全省共有6支球队征战三级职业联赛,让山东球迷倍感自豪。近日,足球大省又有“大手笔”,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加快推进新时代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(以下简称《若干措施》),明确了提高普及水平、畅通成才通道,全面深化体教融合等10条具体措施。

《若干措施》纲举目张,拿出了完整的青少年校园足球“山东方案”,也将为足球大省再上台阶送上精彩的“助攻”。其中亮点颇多,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以下三个方面。

首先,《若干措施》提出,“中小学校要把足球列入体育课堂教学内容,并纳入大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,普遍成立足球兴趣小组、社团或俱乐部,积极参加校内外足球比赛和足球活动”。

学校是青少年学习和成长的重要场所,中小学体育课堂也理应成为青少年接受足球教育的重要平台。长期以来,很多有天赋且热爱足球的中小學生,因为在校内缺少接受足球教育的机会,只能在课余

时间通过校外的培训机构,接受足球启蒙,培养足球兴趣。社会资本兴办青少年足球训练机构,固然也是推动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补充,但是对于很多普通学生及其家庭而言,这种需要在学校与培训机构之间不断往返奔波的足球教育,无论是在时间上,还是在经济上,都意味着不小的成本。一些学生家长为了接送孩子,风里来,雨里去,吃了很多苦,也有不少家长因为不堪重负,不得不劝退孩子对足球的热爱。

把足球列入体育课堂教学内容,并纳入大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等举措,则给广大中小學生提供了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便捷的教学服务,让学球踢球成为不出校园就能办得到的事情。这也是对学生家长实实在在的“减负”,稳住家长,也就稳住了校园足球的基础,进而不断扩大足球人口基数。《若干措施》落地后,青少年足球人口匮乏的痼疾,有望通过校园足球热得到根本解决。

其次,《若干措施》提出,“鼓励各地建立小学、初中、高中校园足球人才

‘一条龙’升学体系,允许小学、初中优秀足球人才跨学区合理流动、成建制升学”。

毋庸讳言,通往职业足球的成长道路有相当高的淘汰率。绝大多数中小學生都没有能力跳出当前的教育升学体系,很难在青少年时期就端上职业足球的饭碗。那些学有所成但是仍然进不了职业俱乐部的足球特长生,应该有多元出路可供选择。否则,不仅学生看不到未来,家长也会为子女的升学就业忧心忡忡。

在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高水平综合改革试点区中学组建足球特色班;有序扩大体校与本科高校“3+4”校园足球人才贯通培养规模;有序扩大高校特别是“双一流”高校足球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规模;持续增加足球运动专业和其他专业足球方向学生招生数量……这些有针对性的制度设计被写入《若干措施》,为校园足球人口疏通了多条成才之路,让热爱足球的青少年看到了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。

第三,《若干措施》提出,“实现校园足球特色学校、新型足球学校、高校足

球学院、职业俱乐部等培养路径衔接贯通”。

长期以来,校园足球与职业足球,各级体校与普通学校,社会资本投资兴办的青训机构与职业俱乐部的青训体系,几乎是“井水不犯河水”。不同的足球培训体系各自封闭运转,不能相互借力、相互补充,既造成了资源浪费,也降低了培训水平。全面深化体教融合就是要实现培养路径的衔接贯通,让热爱足球的青少年能够适时切换路径,尽快到达最适合自己的“位置”,成为更优秀的自己。

山东之所以成为足球大省,很重要的原因是群众热爱,且有厚重的历史底蕴。但是,要实现足球大省可持续发展,仅靠热情和历史是不够的,必须以完善的制度设计夯基垒台,立柱架梁。《若干措施》直击青少年校园足球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痛点和堵点,以系统思维破解深层壁垒,相当于赛前挂出线路清晰的“战术板”。当然,最终“战术”效果如何,还要看各个“位置”能否在实战中贯彻落实。